

30

岳洪治 著

# 弦动华章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音乐出版社

G239.22  
Y949

The Magnificent Journey  
of Music Publishing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 弦动华章

——人民音乐出版社

岳洪治 著

G239.22  
Y949

M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弦动华章: 人民音乐出版社 / 岳洪治著.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12  
(名社 30 年书系)  
ISBN 978-7-103-03644-0

I. 弦… II. 岳… III. 人民音乐出版社—概况  
IV. G23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535 号

责任编辑 吴 朋 杨伯勋  
装帧设计 罗 洪 刘 静 陈晓燕  
责任校对 颜小平  
责任印制 周小滨  
出版发行 人民音乐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网 址 [www.rymusic.com.cn](http://www.rymusic.com.cn)  
邮 编 10003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张 9.75  
字 数 200 千字 插页 16  
印 数 0,001 - 3,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 前 言

在祖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在 2008 年的这个金秋时节，人民音乐出版社喜迁新址，从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搬进了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新落成的办公大楼。走进这座具有现代化功能设施的新楼，也就意味着从此“人音社”又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回首改革开放 30 年来走过的道路，“人音社”的同志们不禁心潮澎湃、激情满怀。

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平凡；我们亲手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创造出了音乐出版史上空前的伟绩，而今想来，仍令人们激动不已。

### （一）

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前身是由钱君匋先生于 1938 年 7 月在上海创办的万叶书店，成立于 1954 年，与中国音协出版部合并，在北京成立音乐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她曾被撤销。1973 年 12 月，由于人民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国务院批转了文化组第 6 号文件，决定恢复音乐出版社（自 1974 年起，社名改为人民音乐出版社）。“人音社”恢复后，下放到干校的人员，陆续被召回北京，重新到出版社上班。至 1974 年年底，全社职工已达 110 人。当时的社址，在朝内大街 166 号。办公室安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的三层。在那一个阶段，“人音社”只拥有几间办公室，总共不过 100 多平方米，条件异常艰苦。许多同志不得不在家里办公。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两年后，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排除万难，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人民音乐出版社也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1979年，经国家出版局批准，由财政部拨款64万元（此项款额，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选址在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营建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办公大楼。办公楼主体为3000平方米，再加上几年后国家二次拨款120万元建成的1200平方米的东配楼，这样，“人音社”的办公楼，总共就达到了4200平方米。

从1981年10月，“人音社”全社迁入翠微路2号院算起，直到2008年9月初，搬到朝阳门内大街新办公大楼为止，人民音乐出版社在翠微路社址办公、营业，整整27个年头。我国改革开放3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在国家投资兴建的翠微路2号院办公楼里度过的。“人音社”在这里不断地深化改革，不断地发展创新，不断地取得令国人欢呼、令世界瞩目的可喜成果……“人音社”感谢党和国家对祖国音乐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对音乐出版工作的支持，感谢上级领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和一个施展才华、激发创业想象力的大舞台。

## （二）

1983年2月，文化部出版局批文（文出字第328号文件），同意人民音乐出版社成立“读者服务部”。“读者服务部”的经营范围，主要是销售本社出版的音乐书谱、期刊、音像资料，和办理邮购业务等，以弥补新华书店发行之不足。上级批准开办“读者服务部”的指令，给“人音社”开启了一个可以自办发行的绿灯。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出版社只管图书出版，而不能经营发行的樊篱，也就冲破了出版社的单一生产模式。从此之后，“人音社”出版的书谱等读物的发行，就不再单单依靠新华书店这个唯一的途径。我们通过自己的“读者服务部”自办发行，从而就可以将书谱等出版物，更加直接和快速地送到读者手中。由此一端，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音乐出版社，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为了把“读者服务部”的工作做好，“人音社”专门成立了发行部。近30年来，发行部的建制不断扩大，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发行量逐年递增，销售额不断

攀升。遍布全国的“人音社”图书及音像制品销售网点,也由最初的三五十处,发展到了现今的 200 余处。在 2008 年“人音社”的机构调整中,为适应市场需求,发行部再度扩展为三个部,即发行一部、发行二部和发行三部,分别负责图书、教材、音像读物等产品的发行,工作人员多达 30 余人。

为了能够给广大读者和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窗口,也为了使人民音乐出版社由单一的生产型单位,发展为一个生产经营型单位,实现产、供、销一条龙,1985 年 10 月 5 日,在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筹备之后,“人民音乐出版社华彩文化公司”终于成立了。公司的营业地址,设在北京西琉璃厂 170 号,那里是“人音社”早年办公的地方。

公司经营的项目,主要有音乐书谱、音乐期刊、唱片、盒式磁带、中西乐器、音像电教器材、工艺礼品及舞台用品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的经营品种,不仅基本满足了音乐爱好者对书谱、有声读物的需求,而且,由于公司能够把与音乐艺术相关的服务项目,也纳入到服务范围之内,因此,公司开业伊始,就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华彩文化公司很快就成了北京琉璃厂地段的一家名店,成了音乐爱好者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但是,华彩文化公司的同志们,并没有故步自封。他们决心把企业做大、做强,经过长期不懈地奋斗,为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公司在进行广泛地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要想更好地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对中、高档乐器的需求,就必须实行“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86 年 7 月,华彩文化公司与香港永胜责任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联合创办了京港合资企业“中国古典艺术有限公司”,同时还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

“中国古典艺术有限公司”集中整合了“人音社”与香港永胜责任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智慧和财力,它的成立,为实现我们把企业做大、做强、弘扬祖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和为国家增加出口创汇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典艺术有限公司”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是生产和出口中西乐器、中国古典艺术品、进口外国生产的乐器、其他相关产品和引进国外电声乐器的现

代技术等。

为了扩大销售和方便与国内外同行们的交流、合作，我们还举办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文化活动。例如 1989 年 3 月，在北京京伦饭店举行了由日本雅玛哈公司主办、华彩文化公司协办的雅玛哈电子琴演示会。我国部分省、市(区)的歌舞团、艺术院校和北京的一些专业文艺团体，都积极派员参加，到场人数达 600 余人之多。随后，华彩文化公司又主办了一场乐器演示、讲座、订货会。这次活动的协办单位很多，包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广州乐团音乐服务中心，以及日本雅玛哈公司、KOLG 公司、三信公司，美国的白威电子公司，香港的曾福琴行等。活动地点是在崇文区文化馆。前来参会的有全国各地的文艺团体和乐器销售商等，多达 500 余人。此次活动，订货和现场销售数额，都很可观，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 (三)

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出版行业前进的步伐也愈来愈大、愈来愈有力了。1985 年 11 月 11 日，人民音乐出版社磁带复制厂的建成投产，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此之前，从境外传入国内的音乐磁带十分风行，而且内容良莠不齐。人民音乐出版社作为国家级的音乐出版单位，有责任，也有义务开展这一方面出版物的出版工作，以满足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对音乐文化新的需求。1982 年，国家出版局(第 640 号文件)批准了“人音社”开展有声读物音乐磁带的出版业务之后，“人音社”立即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音像组。随后，就与北京音响器材厂签订了合作出版协议。按照协议规定，由“人音社”投入编辑力量，由音响器材厂投入资金进行生产，双方以互惠互利的原则，按比例分成。实践证明，双方的合作十分融洽，非常成功。

1983 年 6 月，“人音社”编辑的首批 9 种音乐录音磁带出版，并顺利投入市场。这 9 种音乐磁带包括：《中国古代歌曲》、《江南丝竹》(1)(陈永绿、陆春龄、林石城演奏)、《养正轩琵琶谱》(1)(林石城演奏)、《中国歌剧选段》(李元华演唱，中央歌剧院管弦乐队伴奏)、《春江花月夜》(管弦乐曲，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

韩中杰指挥)、《刘天华二胡名曲》(王国潼演奏,张镇田伴奏)、《外国名曲选》(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刘玉宝、吕蜀中指挥)、《于淑珍、关牧村独唱音乐会》(“海河之春”音乐周实况)、《高飞的海燕》(叶佩英演唱,北京歌舞团管弦乐队伴奏)等。

这第一批音乐录音磁带成功地投入市场后,为“人音社”在音像出版方面趟开了路子、闯出了牌子,同时,也赢得了市场,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热烈追捧。

在这一年里,“人音社”共出版了盒式音乐录音磁带 14 种,总发行量达到 61.5 万盒;出版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复制带 20 余种,发行量达到 29.9 万盒。然而,我们在盒式录音带出版方面的速度,仍远远赶不上人民群众的需求。

为了提高本社盒式录音带的产量,也为了能够帮助兄弟单位大量生产、复制各种音乐录音带,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人音社”决定寻求合作伙伴,共同组建一个磁带复制厂。

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找到了珠海市的华声磁带厂。经过协商,双方顺利达成了由华声厂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瑞士、美国和意大利的录制系统,以及全自动装盒机等全套设备,由“人音社”提供人力和厂房的合作协议。就这样,在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人音社”与华声磁带厂合营的“人民音乐出版社磁带复制厂”终于在 1985 年 11 月 11 日建成,同时举行了开工典礼。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著名音乐家孙慎(“人音社”第一任总编辑)、吕远等人 and 多个在京的文艺团体代表、出版音像制品的兄弟单位的代表、众多嘉宾,应邀参加了隆重的开工盛典。嘉宾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磁带厂的生产车间,并亲眼观看了音乐录音磁带的整个复制生产过程。嘉宾们对厂内精密的机器设备、技工们熟练的工作技术、快捷的生产能力等,均赞叹不已。

“人民音乐出版社磁带复制厂”自开工之日起,至今已经有 20 多年了。这些年来,它一直是在蓬蓬勃勃、蒸蒸日上地发展着、进步着。由于“人音社”和工厂领导管理有方、职工们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因此,它总能够以上乘的产品质量,赢得客户的信任,工厂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壮大。1987 年 6 月,“人音社”建成的



录音棚，也在军乐团大院里正式投产使用了。这个录音棚设有 820 合成录音机两台，调音台为 24 轨，录音机为 16 轨。至此，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录音带出版方面，基本形成了编辑、录音、复制、发行一条龙的生产线。

应和着改革开放的潮音，人民音乐出版社快速而茁壮地成长了起来。在专业音乐人士的工作台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其不可缺少的力量，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 (四)

改革开放 30 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在音乐书谱的出版方面，更是捷报频传，佳绩喜人。

《中国音乐词典》及其“续编”的编纂出版，填补了我国在音乐百科工具书出版方面的空白。

《中国音乐词典》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音乐辞书，它以反映和总结中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为主要内容，对于今天广大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以及关心中国音乐的中外人士，了解中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进而继承和发扬中国音乐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新音乐，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音乐词典》是在 1984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建社 30 周年前夕出版的。它的隆重推出，给欢庆节日的广大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和“人音社”全体员工增添了一份节日的喜庆与欢乐。

然而，翻一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社史，我们就会知道，出版一部《中国音乐词典》的计划，早在几十年前就在酝酿之中了。那还是在 1961 年元月的时候，“人音社”就开始组织了专职人员，着手编辑词典条目。第二年，我们把条目初稿排印出来，并装订了若干册分送给相关单位和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人音社”于 1963 年，又专门成立了“音乐词典编辑室”，并请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何士德同志担任编辑室主任，主持《中国音乐词典》的编辑出版工作。对于这部辞书的编纂，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吕骥同志也十分关心和重视，他曾多次过问辞书的出版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书也有旦夕祸福。“文化大革命”的不期而至,使得《中国音乐词典》的编辑工作被迫终止,半途而废。

“四人帮”覆灭后,全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出版工作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光。1977年年末,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主持召开的“词典”领导小组扩大会议,重新把《中国音乐词典》的编纂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天,著名音乐家吕骥、缪天瑞、赵沅、张庚、杨荫浏、李元庆以及相关同志 20 余人,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就《中国音乐词典》“编辑大要”,及“词典”编辑机构的设立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经过热烈地讨论,大会取得一致意见:推举缪天瑞同志任《中国音乐词典》编辑委员会主任,吕骥同志任顾问委员会主任。从此,《中国音乐词典》的编纂工作,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经过双方人员长达 8 年的不懈努力,这部由全国 180 多位音乐家参与撰写,共收词目 3560 余条,内容涵盖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乐律学、名作、表演术语、乐种、机构、人物、作品、书刊、歌舞音乐、器乐、曲艺音乐和戏曲音乐等,多部类的《中国音乐词典》终于在 1984 年 10 月圆满完成,顺利出版了。

《中国音乐词典》的出版,是一项利在子孙,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是中国音乐出版史上值得骄傲的美丽篇章。

春风日日吹香草,一花引来万花开。在《中国音乐词典》成功出版之后,人音社又陆续出版了《音乐百科词典》(特精装、精装两种版本,缪天瑞主编)、《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精装、平装两种版本)、《音乐译名汇编》(沈阳音乐学院编辑组编)、《二十世纪外国音乐家词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牛津简明音乐词典》([英]迈·肯尼迪主编,茅于润等译)等多种音乐辞书。同时,还相继出版了外国著名指挥家、小提琴家、管弦乐演奏家和歌唱家的词典等。这些辞书和书谱的编辑出版,为广大专业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提供了珍贵的阅读和学习资料,极大地丰富了祖国音乐文化宝藏。

## (五)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编辑出版,是人民音

乐出版社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绽放出的又一簇绚丽的鲜花。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是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书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被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周巍峙任组长)批准,列为我国“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国家艺术科研的重点项目。此项目按行政区划立卷,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负责10卷。全国总共310余卷,每卷约100万字至200万字不等,总共3亿多字。“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程,可谓我国文艺出版史上一个空前的壮举。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开始于1979年。这一年,文化部[(79)文艺第537号文]和中国音乐家协会[(79)音民字第002号文]联合发出了《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音协,要会同地方文化部门组织人力,进行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收集整理工作,并组织编辑出版。通知明确提出: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负责安排文字和乐谱资料的印刷出版工作。

1986年,全国规划领导小组经研究决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两套丛书由人民音乐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

此项工作属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意义重大。“人音社”是国家级的音乐出版单位,全力以赴做好“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义不容辞。

“人音社”领导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为能够圆满完成任务,专门抽调得力的编辑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编辑室”(实为《音乐集成》编辑室),并在出版、装帧设计、排校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各方人士的关怀、支持下,经过全社上下的共同努力、团结奋战,《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上、下)终于在1988年10月顺利问世。该书从正文体例、栏目设置、插页规格、正文标题、字体字号、版式规格,到图书的整体装帧设计、封面、护封、函套的使用等,都是经过“人音社”领导与员工们精心设计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该书的成功推出,为“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书系的出版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全国集成规划领导小组,决定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作为“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出版的范本,提供给其他出版单位,以便使这一国家重点出版工程,能够按照“湖北卷”的样式,

统一规格,整体一致地进入市场。

1988年10月23日,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出版首届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人民音乐出版社副社长杨昌霖同志等,代表“人音社”参加了大会。由于“人音社”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的出版工作中成绩卓著,大会特授予“人音社”及“人音社”印刷排版厂各一面锦旗,以示鼓励。同时,大会还表彰了“人音社”在“集成”编辑出版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郑在勇、倪和文、路宝善、张丛宏等四位同志,并颁发了奖状。“湖北卷”出版后,我们又陆续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宁夏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蒙汉文,上、下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上、下)等多种“文艺集成志书”。

“集成”的出版,是对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水平、出版技艺和出版能力的严峻考验。我们的成功和取得的成绩,鲜明地展示了“人音社”的实战能力。它生动地说明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无比正确,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们这个有着70年历史的老音乐出版单位带来了青春与活力,使得“人音社”能够在国家发展的新时期里,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 (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音乐出版社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托,承担了出版全国通用的“中小学音乐教材”的任务。

出版中小学生音乐课本,这在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历史上是从没有先例的。我们认识到:如今,国家把出版中小学音乐统编教材的任务交给“人音社”来完成,这是因为,我们这家专业音乐出版社所拥有的雄厚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力量,以及在社会上的良好信誉与广泛影响。教材的出版工作,关系到广大青少年的素质培养,关系到祖国的明天,因此,我们只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国主义情怀,把这件事情做好。

为此,我们于1985年7月,特意从全国各地聘请了16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音乐教师和音乐教研员,组成了《教材》编写组。编写组的同志们到位后,以极

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至年底就完成了初稿。1986年年初,“教材”完成定稿,很快就进入了发稿和排印阶段。经过短短半年的奋战,至1986年7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写组编写的《全日制小学音乐课本新教材》(简谱、线谱两套)共24册,就已全部出齐。与课本配套出版的《小学音乐教学参考资料》13册,分简谱、线谱两套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挂图》,以及供范唱、伴奏、欣赏用的立体声盒式录音磁带(共计32盒),也按时出版了。胜利的喜悦,使员工们忘记了几个月来的辛劳。想到自己亲手为孩子们、为祖国的未来做了一件好事,他们的心里无比高兴。

1993年,“人音社”又根据国家教委修订后的教学大纲的要求,对小学音乐课本做了第二次重大的修订。修订后的教材,含简谱、线谱和教师配套用书等,共计49个品种。这套教材,原先只有低年级课本是两色套印的,小学三至六年级的课本,只是单色印制。为了能够适应教学的需要,提高课本质量,我们在这次修订中,把小学课本全部改成了四色精印。同时,我们对中学课本也做了重大修订,24个品种,全部由原来的单色印刷,改成了双色套印。

在做好中小学音乐课本修订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对与中小学音乐教学配套的各种音像教材的新增曲目,全部进行了补录。这项工作,要根据新修订的课本目录顺序,重新进行编辑、剪接、合成。同志们坚持细心操作、团结奋战,在既定的时间里,保质保量地全部出齐了57个品种。

中小学音乐课本以及教学用书、音像教材的出版工作,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启动,至1993年全部按计划出齐,前后共历时三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自接受国家教委委托编辑出版音乐教材的任务开始,就把教材出版工作确立为“人音社”的“重点工程”。为了保证能够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好这个工程,社领导严密组织、科学规划、调集了精兵强将,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第一线。在教材出版的23年间,“人音社”一直坚持教材出版工作与教材改革同步、与教育发展方向一致的原则,全社上下万众一心、协调一致,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教材出版任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教育改

革也不断进行试验、探寻新路。在国家教委(教育部)强有力的领导下,教育改革全面推进、不断深化。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教材编写与出版工作,集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人音版”中小学音乐教材,质量上乘、品类齐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音乐教材出版的范本。

人音社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包括地方性音乐教材和统编的全国通用音乐教材以及音乐教师用书等,多个品种与门类。

(1)地方性音乐教材 6种:

《北京市小学唱歌》(1—6 年级,第一、二学期用,北京市教育局小学教研室编);

《北京市初中音乐试用课本》(简、线版,北京教育进修学院音乐教研室编);

《北京市中学课本音乐试用本》(1—6 年级,简、线版,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

《中学课本·音乐试用本》(简、线版,1—3 年级用,北京市教育学院音乐教研组、天津教育局教材研究室合编);

《地方民间音乐》中小学课本(8 册,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教育编辑室编);

《内蒙古自治区九年义务教育乡土教材试用音乐课本》(1—6 年级简谱本)等。

(2)统编的全国通用音乐教材 4 种:

《全日制小学音乐试用课本·音乐》(简、线版若干册);

《小学音乐参考资料》(简、线版若干册);

《小学课本·音乐》(简、线版 24 册);

《初级中学课本·音乐》(简、线版 24 册)等。

(3)中、小学音乐教师用书各 12 册。

(4)《全日制初级中学课本·音乐》(简、线版各 6 册)。

(5)《九年义务教育小学五六年制课本·音乐》(简、线版)及相配套的教师用书若干册。

(6)《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吴斌主编,简、线版若干册)等。

上述品种之外，“人音社”还出版了中小学音乐教学卡片、音乐教学挂图等。据不完全统计，20几年来，“人音社”共出版各类音乐教材，音乐辅助教材及音乐挂图、挂谱等，累计达到600多个品种。

2. 为了满足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的需要，“人音社”出版各类音乐教材、课本、教师用书等，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各地所需图书印量极大，为了确保教材的出版质量，“人音社”除了对北京就近直接供货外，对外省市的图书供应，则基本采取租型选货的形式。具体办法是：由“人音社”向各省市提供软片，由地方上自己印制发行。

3. 能够针对教材出版时间性强的特点，合理安排出版计划，保证了按时出书，同时，也提升了“人音社”员工的整体素质。

由于在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必须要把教材送到学生和教师的手中。因此，教材的出版，也如农民种庄稼不可误了农时一样，不能够误了课时。因此，“人音社”对于教材的出版，从来都是以倒计时来安排整个工作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务求每一个环节之间，都能够丝丝相扣，不得存有一点闪失。从编辑部发稿，到排版、校对、打型等多个环节，员工们加班是家常便饭。为了保证按时把教材送到师生们手中，工厂的师傅们，有时候甚至不得不24小时不停歇地排版、改样。

4. 高难度工艺的音乐书谱出版，促使人音社员工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增强了“人音社”的实力和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音乐书谱的出版，与一般图书的出版比较起来，工艺要复杂得多；尤其是音乐教材的出版，要求还要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在一本音乐教材中，尤其是在小学音乐课本中，会有很多具有儿童情趣的插图，以及各种形状、大小不等的版面拼接，还要有变化多端的简、线谱音符与谱例；文字与歌词，经常是无规则地相间出现于同一页面上。此种无序的编排，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人音社”的员工们，除了自己一心一意、毫不懈怠地专注于工作之外，也能够随时请教专家帮助解决困难，所以，“人音社”多年来累计出版的近600余种音乐教材及相关读物，基本做到了高品质、高效率。

我们的工作，不仅受到了上级相关部门和领导的肯定，更是赢得了全国中

小学音乐教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与赞赏。

教育部所制定的、关于教材出版要“一纲多本”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相关出版社的积极性，同时，也为教材出版，引来了激烈的竞争。20几年来，音乐教材出版的竞争，从没有停止过，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音社”领导和员工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人音社”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出版社，如今已经置身于市场竞争的旋涡里。如何才能能够在省编教材、市编教材、地区编教材，以及中央有关单位所编教材的多级竞争当中站稳脚跟，力挺主业、继续把音乐教材的出版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有竞争才有质量，有竞争才有速度，有竞争才有市场，有竞争才有“人音社”的发展和进步。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多套音乐教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站稳了脚跟；在产品质量、服务、速度、市场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人音社”的教材图书出版，为国家音乐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人音社”教材图书的出版，在获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带给“人音社”的大好机遇，是市场竞争机制给“人音社”带来的成果。“人音社”有决心继续把音乐教材编好、出版好，把企业做大、做强；“人音社”有能力在音乐教材出版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材出版工程，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 (七)

拓展思路，放开眼界，在向国人和传统学习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引进外国优秀的音乐文化，坚持洋为中用，在实践中发展自己，是新时期人民音乐出版社发展的必由之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音社”有了更多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音乐家、出版家以及书商直接交往与合作的机会。这就使我们能够把我国的优秀音乐文化传播到国外。同时，也能够把国外的优秀音乐文化介绍给国人。在“文革”前的十几年间，人民音乐出版社也曾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了一些世界各国（以苏联最多）的音乐书谱和音乐史资料。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参加国际世贸组织，也没有参加世界



版权组织。我国的知识产权,在国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国外的知识产权,在我国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音乐出版社不仅在吸收和引进外来音乐文化上,舍得花工夫、下力气,同时,还积极施行了“走出去”战略,为促进版权贸易、合作出版、书谱销售、业务代理等事项,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人频繁地进行了互访与洽谈。其中,最主要者,有下列几项:

1982年元月,日本大阪的村上乐器株式会社社长,长谷川博务先生与“人音社”,就双方合作出版事宜,进行了友好的会晤与洽谈。长谷川博务先生是应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他是第一位与“人音社”洽谈合作出版的外国友人。1986年,当长谷川博务先生应邀再次来华的时候,就与我们签署了“协议书”。双方约定,“人音社”在日本的出版事务,在“协议”有效期内,统由长谷川博务先生代理。

1984年12月,联邦德国彼得斯音乐出版社经理罗兰·席德先生,应邀访问我社。双方就合作出版、协助绘谱、引进印刷技术等问题,签署了进行多方面合作的意向书。在此后的日子里,双方签署的大部分合作项目,都进行得很顺利,并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

1985年5月,“人音社”与日本 Sinfonia 株式会社,签署了共同出版《中国音乐史略》一书的意向书。这是我们与外国相关机构,合作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音乐史略》的问世,开启了人音社与外国出版人合作出版的先河。同时,也为中日文化交流,谱写了新的篇章。

在1985年里,“人音社”还与日本卡西欧公司达成协议,拟定合作出版电子琴系列书谱。从1985年至1988年,在短短的三年里,就出版了电子琴书谱四种之多。此后,我们又邀请日本电子琴演奏家吉村宽来华,为合作录制《三用外国电子琴曲选》盒式磁带,及其出版发行事务,进行了交流与洽谈。双方合作推出的《卡西欧电子琴教程》于1988年4月问世。这本书的盒式录音磁带,也同期录制发行。

1987年2月,按照协议的规定,联邦德国彼得斯音乐出版社在纽伦堡、法兰